

郑杭生先生社区调查与社区建设思想研究

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从2006年开始, 郑杭生先生以极大的学术热情, 带领学术团队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持续而广泛的社区调查,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区建设思想。他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逻辑进行了系统总结, 探讨了我国社区建设特有的历史背景、时代使命, 社区建设的实质、目标和重点, 以及独特路径与制度创新等。在此基础上, 他还对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 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观点。郑杭生社区调查背后有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理论自觉意识, 那就是探寻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国经验”,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 这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郑杭生; 基层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 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4)05-0071-10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4.05.008

新世纪以来, 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加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社会的转型也进入更加复杂的阶段,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重心下移及随之而来的基层治理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郑杭生先生敏锐捕捉到这些变化, 并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投入到基层治理的调查研究之中, 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提炼, 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这些研究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 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推进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辞世前一个多月, 郑杭生先生仍然不知疲倦地行走在中国最基层。不为人知的是, 在进行最后几次社区调查时, 他一直随行携带着沉重的药物, 调研中的郑杭生先生, 却仍然充满激情, 丝毫看不出病态。转眼已到郑杭生先生逝世十周年, 本文主要分析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在城市社区调查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及其贡献, 权作怀念!

一、郑杭生社区研究的基本背景与早期实践

社区是社会学的经典概念, 早在社会学诞生之

初就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 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就是当时的代表性作品。中国社会学在1949年以前对于社区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并且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发展出“社区学派”。改革开放后, 我国社区建设经历了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的历程。1986年, 民政部提出在城市中开展社区服务的口号, “社区”作为政策性语言被引入到城市管理之中。1987年9月, 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 总结武汉、上海、天津、北京、常州等20个大、中、小城市社区服务工作的经验。1992年10月, 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市下城区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 把社区服务推到了社区建设的新阶段。1999年, 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2000年11月1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自此, 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 我国社会学界对于社区的关注也逐渐增多。郑杭生先生本人对于社区

[收稿日期] 2024-06-12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北京市城乡社区议事协商机制研究”(23SRA001)

[作者简介] 黄家亮(1980—), 男, 湖北随州人, 社会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基层社会治理、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研究

的关注及研究也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他对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这一主题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也没有做过专门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他逐渐开始将社区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

（一）一般关注阶段（1986—1999）

早在1986年，郑杭生先生组织编写《社会学概论新编》时，就将“社区”作为独立的一章进行介绍。这本经典教材经过大幅修订之后于1993年更名为《社会学概论新修》，至今已经出版过五版和三个精编版，每一版都保留了“社区”这一章，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完善，民族社区、社区建设、网络社区、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内容被纳入不同的版本中。

不过，郑杭生先生本人在这一阶段关于社区的研究则很少，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只有两篇短文或报告中提到“社区”相关内容。一是1994年9月在“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题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PP. 55—61）的报告中，简要介绍了当时国内社区服务的开展情况。二是发表在1999年4月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应把社区志愿服务纳入法制的轨道》^[2]的短文，在介绍天津市新兴街道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倡导要把志愿服务纳入法制轨道。

此外，在整理他留下的资料时，发现他1996年5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社区外来青年业校王佐乡分校开学典礼上所做的题为《做社区人，不做边际人（或边缘人）》的报告讲稿，分析了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区，避免“双重边缘地位”的问题，但未见公开发表。

（二）重点关注阶段（2000—2005）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推进，郑杭生先生对社区的关注也明显增加。

2000年9月，他当选为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在随后的理事会上将社区研究与犯罪研究、社会保障研究一起作为学会的三个研究重点。同年11月8日，他在北京社会学学会和北京社区发展促进会合办的“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充分认识社区建设的重要性》^[1]（PP. 558—559）的致辞，强调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研究是我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快速转型的需要，是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要求，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必经之途，是实现居民自治、促进基层民主、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加强社区建设、社区管理是应对人们日常生活公共化和人际关系疏松化这两个时代问题的重要途径。

2003年至2004年，郑杭生先生对社区矫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新形势下应重视社区矫正问题研究》^[3]（PP. 285—286）、《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4]、《罪犯的本性、犯罪潜能及其社区矫正》^[1]（PP. 229—307）、《社区矫正与当代社会学的使命》^[5]、《社区矫正工作者在社区矫正中的重要作用》^[6]等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从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人的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方式、罪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角度，分析了社区在犯罪控制、罪犯矫正方面的独特作用，倡导“罪行产生于社群也要在社群里得以矫正”的理念。

2005年10月26—27日，由民政部和武汉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社区建设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在武汉召开，郑杭生先生应邀发表了题为《社会弱势群体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从社会学视角看武汉市和谐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的主题演讲，并对武汉市江岸、江汉、汉阳、武昌等区的“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的实践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切实感受到了在社会重心下移背景下社区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他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社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落实处。从抽象程度看，社会是高度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社区则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构建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强弱关系、官民关系和利益关系，重建社会信任，而社区建设则是重要抓手。^[7]之后，他又对武汉市的“家园建设行动计划”的实践经验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重建社会信任具有重要作用。^[8]正是武汉社区调查，使得郑杭生先生对社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也开启了他对全国各地社区建设实践进行系统调查的征程。

二、郑杭生社区调查的全面展开与学术追求

2006年之后，郑杭生先生对社区调查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大规模的社区调查是从广东开始的，之后逐渐扩展到全国各个区域。

（一）郑杭生社会调查的全面展开——广东经验

2005年12月29日，受广东省委的邀请，郑杭生先生给省委第24次中心组学习做了题为《重建社会信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他频频提及自己在武汉市社区调查中收集的资料和案例，使参加会议的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社会学视角的基层调查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邀请他到广东开展调查。随后，郑杭生先生所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了合作协议，开展“广东特色和谐社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综合调查”。

1. 广州调查

2006年11月22日—12月2日，郑杭生先生带领当时在校的7名博士生陈玉生、刘小流、童志锋、汪萍、黄家亮、陈云、李璐和一名刚出站的博士后杨发祥赴广州调查。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研究所的段华明、尹继卫、邓利方、梁荣、许桂林等5名教师和20余名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调查。

调查分两部分：一是在广东省民政厅，以及广州市民政局、公安局、文化局、卫生局、劳保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了解相关政策、规划和典型经验；二是到广州市各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区，直接对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展开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社区建设方方面面的情况，收集了大量一手数据和相关资料。调研组调研的社区包括：海珠区南华西街聚龙社区、天河区天园街骏景社区、荔湾区华林街逢源社区、越秀区锦荣街都府社区和洪桥街三眼井社区、天河区车陂街广氮社区、番禺区大岗镇客家村和石基镇傍西村，增城市新塘镇上邵村和派潭镇榕树下村。

2. 深圳调查

2006年11月29日，在听取课题组关于调研的汇报时，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同志提出，如要反映广东和谐社区建设经验，只调研广州是不够的，还应该增加深圳调查。2007年11月13日—11月18日，郑杭生先生又带领课题组开展了深圳调查。深圳方面的合作单位是深圳市民政局。这次调查同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市民政局、公安局、劳保局、司法局、卫生局、文化局、城市管理局以及盐田区民政局、罗湖区民政局、南山区民政局、宝安区民政局等单位的调查；二是沉入到社区，深入了解社区实践的方方面面，特别关注了居站分设、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新型人民调解等制

度创新在基层社区的具体运作状况，收集了大量的—手资料。调查组走访的社区包括：盐田区沙头角街道办事处中英街社区，福田区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水围社区、福田街道口岸社区，罗湖区翠竹街道办事处的翠竹社区，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沿山社区，宝安区新安街道翻身社区、宝民社区。这些社区分属不同类型，既有高度现代化的新型物业社区，也有单位型、“村改居”型、混合型社区。

广州和深圳社区调查的最终成果体现在《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9]一书中。调研是分专题进行的，不同调研组成员侧重关注不同专题。广州调查时关注的专题主要包括：平安和谐社区建设，社区警务建设，居民消费情况，社区文化建设，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就业与保障，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动员与参与，社区卫生，社区服务，社区工作人才队伍。深圳调查时关注的专题主要包括：社区建设中政府制度创新，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社区党建，社区民生，社区健康服务，社区工作人才队伍，社区管理体制，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就业与保障，社区民间组织。

通过这次调研，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对市域社会和省域社会的社区建设概况有了全面了解。对社区建设的主要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总结、提炼、分析，也形成了城市社区调查的基本组织模式，为接下来的社区调查奠定了较好基础。

（二）郑杭生社区调查的拓展

按照郑杭生先生最初的设计，课题组将开展全国范围的社区调查，在全国选择10个左右的城市逐一进行深入调查，形成“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这些城市包括各种类型：从地域上看，包括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东北等各个区域；从发展水平上看，既有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有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中部城市和相对落后的老工业城市、西北民族地区城市；从层次上看，既有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而且，在各种类型的城市中，力求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将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同探索展现出来，便于概括和对比，以求在实践中相互借鉴，并挖掘实践异同背后所凸显的深层次理论问题。^[9]（PP. 556—557）

因此，除了广州、深圳之外，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还对河南省郑州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

区、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街道等地进行了系统调研，形成了研究专著。由郑杭生先生主编的“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报告”，先后出版了5部，包括：广州和深圳调查的最终成果《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郑州调查的最终成果《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上城调查最终成果《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上城追踪调查的最终成果《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遵义红花岗调查的最终成果《遵义红花岗模式：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新探索》。

同时，在社区调查的过程中，郑杭生先生萌生了在更高层面开展调查研究的设想，并开辟出了另外一个系列的调查，即“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本系列调查以城市发展的不同主题，先后对杭州、郑州、佛山南海区、中山、北京进行了系统调查，出版了5本研究性著作，包括：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三化两型”建设为研究对象的《“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以佛山市南海区社会管理创新为研究对象的《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以中山市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为研究对象的《多元利益诉求时代的包容共享与社会公正：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山经验”》和以北京市“大民政”为研究对象的《“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实际上，除了以上5个城市之外，郑杭生先生在去世前不久，还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广东珠海文明城市建设和浙江临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系统调研，并完成了调查报告，可惜因故没有公开出版。这个系列的调查虽然调查的主题和范围超出了社区，但无一不是把社区治理作为核心主题之一，并下沉到社区开展调查。

除了以上以团队形式开展的系统调查之外，在这一阶段，郑杭生先生还借开会、考察、讲课等各种机会频繁到全国各地进行社区调查，积累了大量关于社区建设方面的经验案例。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对武汉、上海、天津、唐山、南京、苏州、济南、宁波、汕头、秦皇岛、焦作、石

嘴山等10多个城市的社区建设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专门研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讲话等各类学术成果有数十篇。所有这些，共同体证着郑杭生先生社区调查的拓展。

（三）郑杭生社区调查的学术追求

郑杭生先生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见长，在社会学学术生涯中以理论研究为主，且以惜时勤奋著称。即便在进入古稀之年，在时间、精力都更加弥足珍贵的情况下，他竟然能如此执着地花费大量精力投入到社区调查之中，调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调查社区几乎囊括所有类型，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即使在生命晚期还带病坚持在社区调查的第一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郑杭生先生社区调查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一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和学术使命感，这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通过探寻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来解读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中国经验”。

郑杭生先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发展经验，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这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10] 社区建设属于基层经验范畴，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基层经验支撑起了“地方经验”并进而支撑起独特的“中国经验”。因此，他对“社区经验”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更为宏观的“中国经验”。

第二，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理论，形成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学派。

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学缺乏主体性、在国际学术界处于依附状态和边缘地位的状况，是郑杭生先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他还提出了系统的“学科本土论”学说。^[11]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他致力于形成中国社会学派建设，消除“学术被殖民心理”的追求更加迫切。^[12] 2003年“非典”期间，他曾经专门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题词，其中包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所处的世界格局”的概括——“世界格局，欧美占强，中国仍弱，不甘边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国际品质”的概

括——“国际眼光，全球视野，世界观点，五洲胸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本土根基”的概括——“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国际化之路”的概括——“建构本土，超越中国，培育实力，平等对话”。^[13]（P8）关于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地位，建立起能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追求跃然纸上。而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与提升，正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提升学术话语权最重要的途径之一。^[14]

由此可见，郑杭生先生对于社区调查的满腔热情与他之前对于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满腔热情是一以贯之的。正如他所说，“建设和谐社区的讨论，既为社会学深入实际、服务实践，又为它发展学术、创新理论提供了平台。”^[15]（P578）

三、探寻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

探寻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是郑杭生先生社区调查的首要目标。在大量经验调查的基础上，他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了系统总结。

（一）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与时代使命

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仿照哲学家康德在18世纪的经典提问“自然是如何可能的”，提出了“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经典问题。今天，我们在研究社区时，有必要追问另一个问题——“社区是如何可能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提出过类似的问题。^①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是如何可能的”，也即“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变得愈加重要，这是社区研究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郑杭生先生对社区的研究也是从回答这个问题开始的。

郑杭生先生认为，中国社区建设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这首先体现在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以及时代所赋予社区建设的独特使命。

我国社区建设的基本背景是单位制的解体与社区制的兴起。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作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失灵了，单位人转移到社区，成为社会人、社区人，社区逐渐成为了新的基层社会共同体。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社区的特殊历史背景和转型过程，使得我国社区从一开始就承载着独特的多元功能与多重使命。多元功能，是指我国社区需同时实现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维护稳定、民主自治、交往合作等功能，简单说，“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多重使命，是指我国社区建设既要担负重构整个社

会的基本治理单元的使命，又要担负重构人们社会生活的基层共同体的使命。所谓社区建设，就是要通过“建设”，使社区能够实现这些功能、承载这些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陌生化、理性化、多元化逐渐取代了传统社区中熟人化、情感化、单一化的人际关系。“‘熟人社会’的分量渐次减少，‘生人世界’的成分快速增长。新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新的社会团结的要求，新的人际和谐的期待，越来越摆在社会和人们面前，这是因为社会分化不能无限加剧，人际关系也不能恶性疏松，陌生人的世界需要新的连接和整合，否则社会将成为畸形的社会。”^[16]于是，“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成为一个新的“时代之问”。具体来说，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性命题。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的使命就是要构建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17]

郑杭生先生在深圳调查时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此起彼伏，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不断多元化，越来越难以形成“意义共同体”，而没有“意义共同性”就谈不上“社会共同体”，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而社区又是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汇集点，引领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实现社会治理和有效管理的思想条件。他提出，“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不仅提出了在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的时代课题，而且也相应地提出了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环境中构建社会认同度高的意义共同性的时代课题。”^[9]（P10）于是，他把社区共同体拓展为“硬”“软”两个维度：从“硬”的方面来看，就是要在陌生人世界里构建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软”的方面来看，就是要在价值观念开放多元的环境中构建社会认同度高的精神共同体。这两大问题是社区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社区建设的根本使命。社区建设的各项具体举措是否得当，要看其是否能从根本上促进基层社会生活共

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形成。

（二）社区建设的实质、目标与重点

在各地广泛调研的基础之上，郑杭生先生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概括，包括社区建设与公平正义、共建共享、改善民生等重大命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系列重要观点。

1. 社区建设的实质是逐渐落实公平正义

我国大规模的社区建设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下开展的，因此当时社区建设的正式表述为“和谐社区建设”。郑杭生先生提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落实公平正义一样，和谐社区建设的实质也是把社会的公平正义落实到社区制度的各个方面，使社区居民能够感受到公平性与合理性。而公平正义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从正向上来说，就是保持社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特别是要兼顾到社区的弱势群体；从逆向来说，就是按照正义的概念和原则来解决社会矛盾，弥合分歧，控制冲突，增进团结，改善民生，促进和谐。^[17]

他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即有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两个维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首先需要的是一套客观的制度安排，这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社会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开放的、可竞争的。^[9]同时，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同认可、认同，仅仅有制度安排上的公平公正还不够，若老百姓对其“无感”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在国内较早关注到老百姓的主观感受这一维度^[18]。这与后来中共十九大所强调的要注意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一致的。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重社会公正的两个维度的相互转化与互构。一方面，制度安排和利益结构要尽可能照顾到更多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特别是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引导社会成员对公正的感受和认知，形成对社会生活的积极的解释、认可和接受，要通过更加耐心、细致、可感的工作方式，如进楼院、进家庭、进日常生活、进居民心里，来不断推进制度安排的公平与百姓认可的公平的转化与互构。

2. 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共建共享和谐社区

共建与共享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和目标追求。如前所述，郑杭生先生强调，社区建设是要

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微观社会共同体，是要在社区内外建立起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是要把制度安排的公平和百姓认可的公平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社区多元主体的参与，要把社区各主体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不能只是社区居委会“唱独角戏、跳单人舞”。要使得社区各主体都参与进来，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各主体参与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则要构建各主体共享社区资源和发展红利的机制。共建为了共享，共享需要共建，共享是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区建设的目标，共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有真正实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形成共建与共享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得社区建设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19]

3. 社区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完善服务体系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建设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但在实践层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通过社区服务改善社区民生，从而使社区居民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也通过社区服务建起陌生人世界的联结纽带。

可以说，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重中之重。与传统社会的道德整合方式不同，现代社会主要是一个基于利益整合的社会。如果社区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得不到改善、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要想使居民对社区产生认同，那只能是空中楼阁。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最基础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矛盾多发的根源。能否大力改善社区服务，是中国社区建设最切实而严峻的挑战。当代社区建设普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营造健康而充满活力的社区生活，并尽可能使社区成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我价值。

（三）社区建设的独特路径与制度创新

我国社区建设遵循着独特的路径，那就是以党建带动社区建设。要在陌生的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关键是要找到能够整合社区各种陌生人的主导力量，找到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社区建设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社区党建、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等方方面面；社区的主体多种多样，包括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民间组织、

志愿组织等，但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是整合陌生人世界不可替代的主导力量。

郑杭生先生在考察各地社区建设的经验后发现一个现象，即从社区治理结构上看，不同地方的做法大不一样，有“1+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1+2”（社区党组织+ [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1+2+1”（社区党组织+ [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 +社区志愿者大联盟）、“1+3”（社区党组织+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的，甚至还有“1+4”的，即在“1+3”中再加上商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1”，即作为整合核心的基层党组织，目前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在基层起到这样的整合作用。他在考察了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等地的做法后发现，“越是陌生化程度高的社区，越需要社区党组织的支撑”。因此，他认为，“离开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创造新的连接这个基本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区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区建设最大的特色。”^[16] 因此可以说，通过基层党建带动社区建设，即“以党建带社建”，是中国社区建设的独特路径。

要真正实现党建领导下的社区高效治理，离不开社区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处理好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和作为行政组织的街道之间的关系，既要防止居委会的行政化又要防止其边缘化或空心化是社区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在实践中，几乎所有城市的社区制度创新首先都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而且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在社区设置社区服务平台——各地有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社区居民事务办理站、社区事务代办站等不同称呼，履行政府的行政职能，从而减轻社区居委会的负担，使其逐渐“去行政化”。尽管在社区服务平台与社区居委会、街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不同城市往往有不同的探索，如“居站分设模式”“居站并设模式”“多居一站模式”“社区专干模式”等等，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在强调社区各主体之间合作共治、复合治理方面是一致的。

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自觉

郑杭生先生的社区调查有着高远的学术追求。他希望通过社区来认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并且在总结中国经验、反思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这其中包含着鲜明的理论自觉意识。

（一）社区研究与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这一概念虽然是郑杭生先生于2009年才提出，但却是贯穿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的一种追求。^[20]

在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郑杭生先生做了《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著名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理论自觉”这一重要概念，并系统阐述了其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21] 这是涉及到如何开展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如何培养社会学的专业人才、如何开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等根本性的问题。他强调，要“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21]

如何实现“理论自觉”呢？一是对“两类挑战”做出自觉的理论概括，二是对“传统资源”做出自觉的理论开发，三是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四是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21]

应该说，郑杭生先生的社区调查正是受到其长久以来蕴含在内心深处的理论自觉意识的驱使。同时，密集而深入的社区调查使得他更加切实地体会到理论自觉的重要性、迫切性，并激发他将内心深处的反思意识上升为“理论自觉”这一经典概念。同时，检视郑杭生先生社区调查与研究的历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理论自觉的实现路径。

第一，郑杭生先生始终认为，社区建设就是要回应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两类挑战”，一类是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另一类是我国的本土性“六大挑战”。所谓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主要是指随着现代性的扩散而出现的无所不在的不稳定

性。所谓本土性“六大挑战”主要包括：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构建社会共同体；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在生态恶化情况下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区建设就是为了应对上述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六大挑战”。^[21]

第二，郑杭生先生认为，中国社区建设正确路径的设计，离不开对中国自身社会传统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特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认识。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例，中西方在这一问题的历史传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此后，二者的巨大张力有增无减，一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这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家—社会”二分模型的社会基础。而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是上下联通、融合一体的，这与西方历史上二者对立的传统是有根本区别的。从现实维度看，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也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分工合作、良性互动是“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基本形态。^[22]

第三，郑杭生先生关于中国社区的认识，是在与西方社区建设理论批判与对话过程中形成的，是对西方社区建设理论的回应与超越。西方社区发展的基本理念是：“通过还权于民实现社区居民自治，激活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进步，并重建社会生活共同体”^[23]（P21）。而“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人们生活在社区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如同走进他乡异国。”^[24]（P54）但是，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现代社会中的“社区”与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已经发生了巨变，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共同体”所蕴含的互助性、归属感、亲密感等因素的需求与日俱增。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具有与滕尼斯那个时代不同的内涵，简单地复兴传统已经无法有效地解决当前我们遇到的社区生活。而中国的社区建设与西方社区建设的文化与传统均有不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中国的社会转型也赋予了社区建设一些特别的功能。郑杭生及其团队倡导的社区建设论是在系统而清晰地梳理西方社区建设的发展历程、时代背景、历史

局限等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区发展独特逻辑的理论提炼，也构成了对西方社区建设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第四，郑杭生先生关于社区的理论是对城市基层治理领域“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城市社区建设是一场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基层实践与探索，郑杭生先生关于社区建设的一系列独特观点和理论正是在立足本土、实地调研基础上对中国基层治理经验的理论深化。

（二）对“社会资源”的理论反思

在社区调查过程中，郑杭生先生发现“社会资源”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对这一日常通用的概念进行了学术解读，将社会资源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作为社会建设与社区建设的核心命题。所谓“社会资源”，是指一个社会及其社会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机会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所谓“社会资源配置”则是指上述各种资源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25]发现社会资源的重要性之后，他用这一概念对社会学学科的诸多基本范畴如阶层阶级、社会正义、社会建设等重新进行了定义。^[15]（PP. 104—136）不同群体占有社会资源或掌握社会机会的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或者说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社会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也是社会建设的内涵和本质，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内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

在对杭州等地的社区进行调查时，他发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不能再依靠单一主体，而需要“社会复合主体”^[26]。复合主体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维模式”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配置主体实际上只有政府这“一维”是不同的。在三维模式中，三个主体具有各自的特殊作用，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调整这三者的关系，建立起“政府—企业—社会”的三维合作。^[27]（PP. 1068—1082）

（三）对西方治理理论适用性的反思

在社区调查中，郑杭生先生还深刻感受到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西方治理理论之间的张力，并主张对西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反思。^[28]

无论中西，政府、市场、社会都是治理的三大

主体，三者既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又是相对独立的、有着各自独特运作逻辑和特长的三大部门，只有三大部门的关系理顺了，才会实现有效治理目标。对于社区建设来说，理顺三大部门关系、构建多元复合治理体系，是一条基本主线，而三大部门的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建这一主轴展开一样，包括社区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个社会体制的改革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建这个主轴展开的。^[23] (P135)

在西方治理理论中，国家与社会往往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为了防止国家对市场和社会的侵犯，往往对国家权力做了严格的限制。“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表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是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对立起来，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对市场和社会进行了严格限制，造成有国家而无社会。在郑杭生先生看来，实际上，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可以相互合作、彼此形塑，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

郑杭生先生基于社会调查的实践，发现国家与社会在基层治理实现中是能够很好合作的，国家的存在非但不必然会影响社会领域的自治，如果处理得当，还会促进社会领域的自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自治，他认为“自治”并不是“让政府走开”，而是要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自治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与政府合理分工，明确

政府该做什么、社区又该做什么，这种自治是“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框架下的自治。自治不等于不要政府和市场等其他主体，而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合理划定三者的分工。“自治是一种关系，自治是一种分工，自治是一个过程”。^[29] 自治是一种关系、一种分工，说的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合理划定三者的分工，三者谁也离不开谁。处理三者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处理党的领导与居民自治的关系。“现在中国的基层自治还是一种党政主导下、促进下的自治。中国的自治，跳不过这个阶段，尤其在开始阶段，自治需要政府来搭台。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社区不断提高自己的自治性，逐步形成基层的自治体系。”^[15] (P736) 中国社区建设的实践表明，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合作”模式是完全可能的。^[30] 这对西方治理理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构建中国治理理论的重要基石。

2009年12月，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即将付印之际，郑杭生先生又拟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十幅题词，其中前两幅是“踏遍中国，草根立地，超越本土，前沿顶天”和“综合创新，话语有权，建设学派，走向世界”。从《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三卷出版的2003年到编辑第四卷的2009年，正是郑杭生先生带领团队如火如荼开展社区调查的几年。这两幅题词无疑也是他社区调查的某种总结！

[注 释]

① 可参阅：冯钢《现代社区何以可能》，《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闵学勤《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基于中国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6期；吴莹《社区何以可能：芳雅家园的邻里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 郑杭生. 应把社区志愿服务纳入法制的轨道 [N]. 人民日报，1999-04-02.
- [3] 郑杭生.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当代社会的热点问题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4] 郑杭生，程琥.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 [5] 郑杭生. 社区矫正与当代社会学的使命 [J]. 江西社会科学，2004，(5).
- [6] 郑杭生. 社区矫正工作者在社区矫正中的重要作用 [J]. 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4，(2).
- [7] 郑杭生. 社会弱势群体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从社会学视角看武汉市和谐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 [J]. 学习与实践，2005，(11).
- [8] 郑杭生.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重建社会信任的正确途径——从武汉实地考察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刻含义 [J]. 学习与实践，2006，(2).
- [9] 郑杭生主编. 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 [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 [10] 郑杭生.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 [N]. 光明日报，2009-12-03.

- [11] 郑杭生.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 (5).
- [12] 郑杭生. 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 (6).
- [13] 郑杭生.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 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4] 郑杭生.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2).
- [15] 郑杭生.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 “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6] 郑杭生. 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 [J]. 学习与实践, 2008, (7).
- [17] 郑杭生. 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7, (6).
- [18] 郑杭生, 黄家亮. 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及其破解 [J]. 社会科学家, 2012, (1).
- [19] 郑杭生. 在共建中共享, 在共享中共建 [J]. 求是, 2007, (10).
- [20] 洪大用, 黄家亮. 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 [J]. 社会学研究, 2015, (3).
- [21] 郑杭生.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 (5).
- [22] 郑杭生.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 [J]. 社会学研究, 2011, (4); 杨敏.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J]. 河北学刊, 2011, (2).
- [23] 郑杭生主编. 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 [24] [德]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M].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5] 郑杭生. 抓住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配置这个关键 [J]. 求是, 2013, (7).
- [26] 郑杭生, 杨敏. 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品牌网群——以组织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杭州经验” [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1, (4).
- [27] 郑杭生.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28] 郑杭生, 邵占鹏. 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 [J]. 社会学评论, 2015, (2).
- [29] 郑杭生. “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J]. 社会学评论, 2014, (3).
- [30] 杨敏.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J]. 河北学刊, 2011, (2).

Professor Zheng Hangsheng's Community Survey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oughts

HUANG Jia-li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RC)

[Abstract] Since 2006, Mr. Zheng Hangsheng has led his academic team to conduct continuous and extensive community survey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great academic enthusiasm, forming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theory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Behind the investigation of Zheng Hangsheng's community lies a strong sense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academic mission, which i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o construct a sociologi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Through community surveys, h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plored the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ra mission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essence, goals and prioritie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unique path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n this basis, he also conducted in-depth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so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sociology, and proposed widely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viewpoints,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sociology.

[Key words] Zheng Hangshe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oretical self-awareness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